

晚清中俄东部边界安全形势 变化与呼伦贝尔新政

孔 源

内容提要 同一处边境地带的地缘政治意义,在两国间力量消长的过程中,常常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变化更替。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部边境维持了近百年的平静态势。局面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沙皇俄国向黑龙江流域的进一步侵略和对东蒙地区的经济扩张,处于蒙古高原和黑龙江流域交界处的呼伦贝尔,数十年时间内安全局势突转严峻。为了抵消威胁、巩固边防,新政时期清政府开始对呼伦贝尔进行整体开发。呼伦贝尔局势的骤变,是经济文化变迁影响地缘政治局势的颇好例证。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俄 东部边界 呼伦贝尔 清末新政 沙皇俄国 清政府

地缘政治的结构是地理与政治力量互动的结果。^① 在地缘政治视角下,边疆、边界问题的产生与发展经常是动态变化的过程。曾经的军事要地在大国

* 孔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邮编:100006)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 [美]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战略重心改变时有可能成为宁静之地,而一段长期稳定的边疆也可能在短时间内转变为危机焦点。对于清代尤其是晚清的中俄边疆问题,在近代以来史观的叙述传统之下,有些中国学者对中俄问题持这样的基本预设:沙俄侵华是在两国原本基础国力相似、地理条件相当的条件下,因沙俄的“侵略成性”和中国的“积贫积弱”而导致的。这类观点往往将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视为静态,并且过于强调两国政府的主导作用。

按照近代以来较为通行的历史观念,从1689年《尼布楚条约》到19世纪中期,沙俄早有侵食中国的祸心。但是,18—19世纪沙俄在亚洲的侧重点主要是面向奥斯曼、波斯等地的“东方问题”,沙俄开拓太平洋北部堪察加乃至阿拉斯加等地远早于侵扰中国。用近代以来通行的史观同样无法解释清楚的是,沙俄侵华之耻为何出现在黑龙江沿岸。若以前态势而论,黑龙江沿岸在1900年前的边境安全一直要好于西部和北部边疆。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两国沿额尔古纳河的国界首先得以固定。在此后的一百余年中,呼伦贝尔几乎成为中俄边界上最平静、双方军事对峙较少的地区。然而,随着俄国近代化进程的发展和向外扩张,中俄东部国界上的相对平衡在19世纪后期被急速打破,清朝的东北边疆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形势转变之快,令当时的清朝文人感叹不已。光绪十一年(1885年),撰写《东北边防辑要》的曹廷杰有感于其时东北边疆的局势,把时下状况同咸丰八年(1858年)时的局势做了对比,称“其时东南多事,俄人乘隙窥我东北。尚有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城定义界碑,足严中俄之限……今则疆界已殊,情形不同矣”。^①咸丰八年时,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虽因《瑷珲条约》被割让,但沙俄哥萨克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活动尚少,直接的武装冲突也不多见。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时候,中国东北边疆的形势转而日益严峻起来。形势变化之惊人,在临近两国分界额尔古纳河的呼伦贝尔地区尤其明显。这种局势转变是沙俄经济军事扩张的结果,剧烈的变化虽体现于呼伦贝尔一隅,牵动的却是中俄关系大势和远东战略全局。

本文借助地缘政治学理论,依据中俄历史文献,以呼伦贝尔地区为案例,尝试重新探讨中俄东段边疆局势在19世纪后期出现逆转的原因。美国政治地理学家科恩(Saul Bernard Cohen)将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特征,总结为一组圈层结构。在科恩总结的模式中,从一国的边疆前哨到内地,是从“边界”——

^① (清)曹廷杰撰:《东北边防辑要·序》,载《曹廷杰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页。

“空旷地区”——“有效国家领土和有效地区领土”朝向核心区过渡的。^①即使是在边界稳定的情况下,内在圈层之间的运动也会最终改变边疆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清朝中俄东部边境从平静到危机,正是在表面稳定的边境之下,政治地理圈层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清朝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开发长期缓慢

17世纪末,欧亚大陆上兴起的清朝、沙皇俄国和噶尔丹博硕克图统治下强盛一时的卫拉特汗国,都在这个时段扩张到了蒙古高原的东部边缘,黑龙江上游地区成为几个政权拉锯争夺的地带。从雅克萨之战到《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清朝将黑龙江流域其视为安全形势最为敏感的区域,称“黑龙江最为扼要”。^②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二十九年(1699年)同噶尔丹围绕克鲁伦河、呼伦湖、贝尔湖与喀尔喀河的战争中,这一带也被视为前哨要地,康熙皇帝特别指出“克鲁伦河乃噶尔丹至要必争之地”,^③结束中俄间战事的《尼布楚条约》,与将卫拉特贵族驱回蒙古高原西部的昭莫多之战,彻底终结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面。在此之后,几代卫拉特贵族的势力范围逐渐收缩回漠西,而18世纪的俄国也开始把战略重心放在了西向争夺欧洲霸权上,额尔古纳河与呼伦湖等处转瞬之间成了远离战事之地。雍正十年(1732年),清朝在这一地区设立了呼伦贝尔八旗。

沙俄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并不强大。从18世纪文献《东西伯利亚古代教会》的报告来看,除外贝加尔当地各城堡之外,哥萨克人几乎很难立足,并被包围在异民族的文化环境中。外贝加尔哥萨克和周边民族联系松散,受其影响。这与建立了严密驻防体制的呼伦贝尔八旗迥然不同。即使从直接的军事力量来看,沙俄在外贝加尔的投入力量也不甚多。按《外贝加尔哥萨克简史》的记录,整个外贝加尔边区军人身份的哥萨克,在1734年仅有1521人。^④

① [美]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40页。

② 《平定罗刹方略·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3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版,第428页。

③ (清)温达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三》,载《西藏汉文文献丛刊(第四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影印版,第516页。

④ [俄]安德利耶维奇:《从古代到1762年的外贝加尔简史》,圣彼得堡:军事出版社1887年版,第173页(Андре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от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762 года. СПб.: Воен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887. С. 173.)。

与此同时,18世纪的康雍乾时代中央政府对呼伦贝尔已然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据《呼伦贝尔志略》所记,雍正十年,朝廷调拨索伦巴尔虎达呼尔鄂伦春等族兵丁3000人,雍正十二年(1733年)从车臣汗部调派2484名新巴尔虎兵丁。^①这是旨在加强边界失控能力的重要举措。但是,地理条件的不利最终影响了呼伦贝尔的建设和军力发展。大兴安岭北部交通的不便,大大加深了呼伦贝尔长期驻军的难度。大兴安岭虽然不是很高的山系,但北段地区几乎没有宽谷,山中又常有断陷形成的峭壁。民国时期人们将其形容为“其形势如海波奔驰,鲜交通往来之路云”。^②大兴安岭北部也是分水岭最为狭窄的地带,在扎敦河与诺敏河之间,根河与甘河之间,河谷几乎相连一起。同经绰尔河以南通向松嫩平原的道路相比,从呼伦贝尔八旗到黑龙江各城的道路要更加艰辛。这里人迹罕至,交通不便,但作为官方驿路设立的区域,这里几乎是清代从黑龙江各城向呼伦贝尔调派八旗官兵的唯一路径。难以克服的交通问题,加剧了清代呼伦贝尔开发建设的难度。雍正时期增派的各族兵丁,不久就因为仓廩不足、家小离散、牧群缺少等问题,而被大量转而调派他处。

到清末新政之前,清政府在呼伦贝尔所剩余的行政和军事力量较为薄弱。20世纪初,在这片总面积计共15.5599万平方公里^③的土地上,驻守的八旗部队只有领催212名,前锋42名,甲兵2583名。^④同时,在呼伦贝尔同俄国总长约1500余里^⑤的边境线上,驻守这段边疆的卡伦官兵长期以来总额不过二三百左右而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宋小濂整顿边务,将边境卡伦“增设至二十一卡,每卡弁一员,兵二十二名”,^⑥呼伦贝尔中俄边界上的直接边防力量仅超过400人。此外,清末新政以前,呼伦贝尔的内地移民也寥寥无几。中俄在额尔古纳河沿岸的边界,几乎是中方边界地区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地带之一。

清代呼伦贝尔不仅兵力薄弱,所驻八旗部队从生活习惯到武器装备也比较落后。在光绪六年(1880年),呼伦贝尔的各族边防官兵,仍然保持着游牧狩猎人群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畏暖喜寒,惯于露居野出,即雪夜冰天,亦只

① 程廷桓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4年版,第107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苏]阔尔马佐夫:《呼伦贝尔》,哈尔滨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1929年中文版,第1页。

④ 《呼伦贝尔志书稿》,载《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页。

⑤ (清)宋小濂:《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载李澍田主编《宋小濂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⑥ 程廷桓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第72页。

用毛氈蓬包席地而卧”,^①而不习惯驻扎营房。1887年秋季,俄军上校加尔纳克行至呼伦贝尔,眼中所见的海拉尔军营空空荡荡,连中国士兵的声音都听不到。^②

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上半期,清朝人眼中的额尔古纳边界依然以平静之态为主。至19世纪中期时,外贝加尔地区还不是沙俄的驻兵重地,呼伦贝尔边境上两国直接的交锋和纠纷较之恰克图等处要少得多。俄国进入中国人的实际视域,是从清初中俄双方在边疆地带碰撞开始的,清朝人对俄国的了解也是随着边疆谈判和国家使节往来而获得的。也就是说,在直接交涉以外,清朝对俄国并没有投入足够的注意。在漫长而空旷的中俄边界上,管理的协同一致与信息的有效传播都变得困难。各地地方官员常常从局部地区的经验出发去判断边境局势,缺乏对沙俄整体战略的宏观判断。中央朝廷和知识分子所看到的中俄关系形势,往往也只是边境上个别冲突的汇总,潜藏的巨大危机却被忽略了。这种状况直到咸丰朝依然如此。日本学者吉田金一曾尖锐地指出: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何秋涛不久前所编中俄关系论著《北徼汇编》迅速得到了朝廷的重视,认识到沙俄威胁的咸丰皇帝还为此书亲赐书名《朔方备乘》。但是,努力搜集有关沙俄知识的何秋涛,所能了解到的距当时最近的知识来源,竟然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图理琛所撰的《异域录》。^③

二、沙俄开拓东蒙古商路与呼伦贝尔形势骤变

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称,“哥萨克骑兵席卷亚洲的向东猛扑,差不多和绕道好望角一样孕育着重大的政治后果”。^④如果说叶尔马克东侵的尝试还是开始,到18世纪,“追随在哥萨克人之后的俄国,从它以前隐居的北方森林中安全地走了出来”。^⑤19世纪中期以来,沙俄开始加快了开发外贝加尔的步伐,

① 奏为核销呼伦贝尔应修营房改置蒙古包用过工料银两事,光绪六年(188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03-0171-012。

② [俄]加尔纳克:《加尔纳克上校1887年从旧粗鲁海图边卡沿大兴安岭西坡前往北京行纪》,《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第34期,圣彼得堡:军事出版社1888年版(Гарнака. Г. Ш. Описание пути от Старо-Цурухайтуевского караула до Пекина вдоль западного склона Бол. Хингана., Г. Ш. Полковника Гарнака. 1887г. //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СПб., : Воен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888, Вып. XXXIV.)。

③ [日]吉田金一:《近代露清关系史》,东京:近藤出版社1974年版,第212页。

④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58页。

⑤ 同上,第59页。

呼伦贝尔的安全危机也随之而来。1851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下旨,从伊尔库茨克省析置^①外贝加尔边区,同年又设置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区,沙俄势力开始一步步逼近呼伦贝尔。

咸丰十年(1860年)初,俄境粗鲁海图的一位俄军少校,照会呼伦贝尔副总管乌尔图那逊,放言“许我们由蒙克西里卡伦……径入你们交界那罕台地方砍运担木干柴,祈为特报”。那罕台位于今日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以北的沙岗地带,邻近海拉尔城,已然处于呼伦贝尔腹地。对于这样的要求,乌尔图那逊明言“海拉尔河两岸皆系新旧巴尔虎人等游牧之地,断难任其闯入”,^②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在同治元年(1862年)初,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奏朝廷,进一步指出了呼伦贝尔边务松懈之处,称近来常有“俄国民人越界偷割羊草,或二三百堆至五七百堆不等,并有偷挖地窖等事”,^③奏请将监管不力的时任呼伦贝尔总管珠勒格纳革职。咸丰对此给予重视,在寄与特普钦的上谕中一再强调“防微杜渐”“随时严密防范”等语。^④但戍边官员的爱国努力,并不能阻止边境局势的全面恶化。随着当年春季《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俄国获得了自由贸易的权利,呼伦贝尔一带受到的威胁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的秋季,在离中俄边界已有一定距离的海拉尔河流域也发现了俄国人的踪迹。越界的俄国人在海拉尔河口安设了水磨板房,又在溯河而上修建了数处窝铺。^⑤

呼伦贝尔的危机不仅仅是局部范围内的边患。《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占领了黑龙江下游和日本海沿岸地区。要加强新占领区同南西伯利亚的联系,俄国就需要在外贝加尔和黑龙江之间开辟道路,使其既可以较快加强两区域间联系,同时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些因素促使当时的沙俄政府开始探索从南西伯利亚取道清朝通往去往阿穆尔边区和滨海地区的交通。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沙俄政府为了打通外贝加尔同阿穆尔边区的联系,开始派遣商业和外交使团前往探路。1864年,克鲁泡特金公爵首次详细记载了自粗鲁海图至墨尔根的交通状况。1865年,希尔科夫斯基也对自粗鲁海图和阿巴该图两路入呼伦贝尔交通进行了早期调查。克鲁泡特金、马列维奇、

① “析置”是指从原有的行政区划中分离处新的行政区划。

② 《奏为遵查呼伦贝尔附近并无英阿达河名目及今日夷情事》,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汉文录副,03-4248-028。

③ 上谕字寄署黑龙江将军特(普钦)、齐齐哈尔副都统那(敷德),军机处上谕档同治元年正月十三第1号,盒号1244,册号1。

④ 同上。

⑤ 上谕字寄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军机处上谕档同治二年八月十八日第1条,盒号1258,册号3。

希尔科夫斯基等人几次进行跨岭探路,大体路线都是穿越呼伦贝尔进入嫩江右岸河谷,利用清代黑龙江所设的台站进入墨尔根城,再继续行至黑龙江城(瑗珲)边境。外贝加尔边区同阿穆尔边区间相对便利通道的形成,也就意味着自蒙古高原到东北的通道被沙俄打通。外贝加尔与黑龙江以北地区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标志着呼伦贝尔边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自此,俄国人开始将大兴安岭作为往来外贝加尔和阿穆尔间的便捷通道。1864年,11名俄商持恰克图贸易执照,准备从库克多博入境越大兴安岭去往墨尔根城贸易,遭中方拒绝。^①1876年,将军丰绅汇总奏报了这一年非法进入呼伦贝尔俄国私商的情况:其中沿境贸易的有50人;进入乌尔逊河一带贸易的有14人;到甘珠尔庙会(即敕建寿宁寺)贸易的有14人,而携带牲畜在呼伦贝尔穿越边境,试图穿越大兴安岭前往墨尔根城,然后再从瑗珲越境前往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竟达73人。^②从越界事件总数规模看,此时俄国对呼伦贝尔的渗透规模仍不大。但从目的地看,此时俄国人的越界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偷越行为,而是对呼伦贝尔乃至整个黑龙江地区的全面渗入。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提到的取道呼伦贝尔前往沙俄阿穆尔边区的73名俄国人,是以“那木萨赖”为首。^③那木萨赖显然是一个蒙文名字(Namsarai,意为佛教中所说的多闻天王),当为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而俄境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石勒喀河以西的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与上乌金斯克两个军区。俄国军官在19世纪60年代探查的额尔古纳河—阿穆尔通道,此时也已经被布里亚特人熟悉和使用了。奏折中汇总的越界情况应只是冰山一角。其后数年,俄商私往呼伦贝尔及取道呼伦贝尔前往阿穆尔边区的事例屡见不鲜,屡禁不绝。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员对呼伦贝尔的时局开始有了更多的重视。同治四年(1865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以“呼伦贝尔地方与俄罗斯接壤之处甚多,该员熟悉情形,历年办理夷务深属得力”为由,^④奏请将戍守松花江流域重地的宁古塔副都统三克都多尔济留在呼伦贝尔办事。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于呼伦贝尔中俄交涉日益频繁,黑龙江将军德英以“近年军务夷务案牍、较昔

① 转引自张凤鸣:《19世纪后半期黑龙江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贸易》,《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1期,第125页。

② 黑龙江将军丰绅等奏为汇奏俄人越界事折,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转引自《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元年—七年)》,第129页。

③ 同上。

④ 《奏请准三都克多尔济留呼伦贝尔办理夷务,其宁古塔副都统请另简员署理事》,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五日,朱批奏折附片04-01-01-0886-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倍增,事事均关紧要……每遇派查卡所会见俄夷,诸凡最关紧要,兼有会办互换字据事件,各翼笔帖式仅各一员,实不敷用”,^①提请在呼伦贝尔增设数名笔帖式。所有这些表明,随着沙俄对远东的开拓,呼伦贝尔局势趋于复杂,开始引发清朝地方官员的进一步警觉。清朝在呼伦贝尔的设治标志着管理策略的转型,不再将其作为单纯的空旷缓冲地带,而要切切实实加强对它的实际控制。但是这种加强实际控制的办法,仍然不脱离传统的固边防边。

18—19世纪沙俄东侵的加剧和中国方面反应的迟缓,涉及两国边界内“空旷地”的地理因素差异和管理的不同。俄国的哥萨克将“空旷地”视为国家新的富源之地。哥萨克出身的俄国作家帕尔申在1844年放言,“俄罗斯人征服同美洲一样富饶的西伯利亚时,则是用自己的鲜血在那里获得了统治权”。^②而对于清朝人,“空旷地”仍然是传统观念下是战略缓冲备用的“瓯脱”。^③就连思想进步的薛福成1891年参与论及中缅分界谈判时,尽管划界过程中英方提出了一定的领土补偿条件,薛仍然以传统视角担忧“果能将南掌,与掸人收为属国,或列为瓯脱之地,诚系绥边保小之良图……若徒受英人之虚惠,而终不能有其地,恐转为外人所窃笑。倘因此别生枝节,又非计之得者”。^④

三、沙俄影响下呼伦贝尔危机的深化

以商人与军官的探险活动为先导,19世纪70—90年代间,沙俄势力在大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开始进行了全面扩张,沙俄人员渐渐形成了无孔不入之势。19世纪70年代,弗里特舍进入中国,对大兴安岭南北进行了全面的气象调查,随之而来的是加尔纳克、斯特列比茨基等军人的军事调查。同前人相比,加尔纳克、斯特列比茨基等人对大兴安岭山地和嫩江水系的综合考察更为细致,对军事需要也更加关切。19世纪80年代来华的加尔纳克在报告中专门讨论到,若在缺少水源和木材的地方行军,将对俄军造成何种不便。19世纪90年代来华的斯特列比茨基在对中东铁路拟建线路进行勘查时,对从粗鲁海

① 《奏请准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三司等处添设笔帖式事》,同治十二年,朱批奏折附片04-01-01-0919-0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4页。

③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称两游牧民族“中间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后世“瓯脱”常被用来指代位于中原王朝和外族之间,一方或双方任期荒废的战略缓冲地带。

④ (清)薛福成:《滇缅分界通商事宜疏》,载《近代中国史料第九十五辑·庸庵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130页。

图直接越境,经行阿巴该图的两条入呼伦贝尔通道,以及从新巴尔虎八旗朝向多伦诺尔的交通便利性、水源情况、是否适宜军马前进等军事地理情况都进行了认真的勘查。他们还总结了取道呼伦贝尔进军中国的主要军事通道。1900年后,齐齐哈尔、布特哈、墨尔根和瑗珲的陆路交通情况已被俄国人尽数掌握。^①

沙俄商人在呼伦贝尔南下蒙古的通道上也开始活跃起来。到19世纪70年代,沙俄对取道呼伦贝尔的东蒙古商路有了更多的认识,对中国东北和内外蒙古的进一步经济侵略扩张也拉开了序幕。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签订了《伊犁条约》,沙俄基本上获得了同中国全面通商的权力,沙俄货币也开始向蒙古草原和中国东北扩展。从19世纪末期的一件事情中,就能够看到沙俄巨大的阴影已经不知不觉地笼罩在呼伦贝尔草原深处了。1899年,探险家波塔宁来到呼伦湖西北的乌胡尔图湖时,向一位来自义州的中国行商购买绵羊。行商出乎意料地拒收了中国人习惯使用的银子,而将纸卢布作为首选。^②1908年秋季,在甘珠尔庙集市上出现的俄国商人已经不仅仅是来自外贝加尔的边贸人员,而且包括设在海拉尔的公司“安多维洛夫”“梅耶洛维奇”“俄蒙贸易”与“乌苏里”合股公司等商号,甚至还有来自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和中东铁路满洲里车站的俄方人员。^③

面对这种局面,一些有识之士在“庚子之变”前就做出了回应。1883年,曹廷贤撰写的《东北边防辑要》对呼伦贝尔临敌首当其冲的境地和边防重要性已经做出了清晰阐述,明言“今其地又据俄人由尼布楚入混同江水路之咽喉,筹边者顾可忽乎哉”。^④但是,对于地方官员而言,预警似乎还稍稍早些。毕竟从外贝加尔边区建立到19世纪90年代的几十年中,尽管沙俄方面已经在黑龙江流域制造了新一波威胁,但由于沙俄在外贝加尔和阿穆尔两个边区的势力还不强大,额尔古纳河同黑龙江依然能起到一定的防边作用。19世纪末,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与贝加尔湖地区轮船运输的兴起彻底扭转了呼伦贝尔边境的

① [俄]格列宾希科夫:《沿嫩江从布特哈到墨尔根》,《亚洲通报》1910年第2—5期(Гребешников. А. В Бутху и Мэрген по Р. Нонни//Вестник Азии, Харбин, 1910, No. 2-5)。

② [俄]波塔宁:《1899年夏大兴安岭中部之旅》,《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学报》1901年第5期,第355—483页(Потанин Г. Н. Поездка в среднюю часть Большого Хингана летом 1899 г//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Пб., 1901. Т. 37. Вып. 5-С. 355-483)。

③ [俄]特列季亚克:《兴安周边考察日记》,《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记事》,1912年第1期,第37页(Третьяк. Дневни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округ Хингана//Записк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 Р. Г. О., Хабаровск, 1912, Т. 8. Вып. 1. -С. 37)。

④ (清)曹廷杰撰:《东北边防辑要(卷下)·黑龙江察边考》,载《曹廷杰集》,第5页。

力量对比。贝加尔湖水运的兴起与外贝加尔铁路的修建,使沙俄军事力量在额尔古纳河的边境上获得更大优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黑龙江将军恩泽不禁感叹“呼伦贝尔素以僻静之区,变为冲要”。^①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俄军大举侵略东北,首次从呼伦贝尔和黑河一线大举越境侵入,江防的不堪一击给中国官民带来的不仅是惨痛记忆,也是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战争结束后,沙俄人员非法越过界河的行为也愈演愈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据报额尔古纳河沿岸“数年之间,俄人越界搭盖窝棚三百余处,蒙包五架,男女一千五百余口,开垦荒甸十二段,约地一万余垧,哈拉尔河、鄂里霍普沟等处俄人陶挖矿坑二百余窟”。^②

中东铁路的出现不仅从军事上为沙俄创造了自外贝加尔侵入东北的条件,也为沙俄在经济上渗透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麦金德赞叹这条铁路的价值:“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路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像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内所发挥的这种效果。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替代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发展公路的阶段在这里被省掉了。”^③ 从中东铁路动工到通车,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和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腹地成了俄国人随意往来之地。在中东铁路建成后,沙俄人员在从额尔古纳河到大兴安岭的广阔地区中,从季节流动变成了长期盘踞。除大量俄国人员进入沿线以外,俄国人还以铁路部门的名义绕过中央政府招募华工。日俄战争前夕,程德全论及东北边防形势就称,“呼伦贝尔一城,因铁路开工,沿途皆俄人所招苦力,官荒遍野,任其占据。俄人亦间有携家来住,官不过问”。^④ 此时的呼伦贝尔乃至全黑龙江已到了利权外溢的危机关头。对大兴安岭的林业资源,俄国人也开始了大规模掠夺。中东铁路修建后俄国人不仅取得铁路沿线的牙克石等处林场,还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铁路以外。1900—1905年间,俄国人与其招募的华工甚至在海拉尔河以南、远离铁路的索伦右翼地区大肆砍伐木。辉河、锡尼河、红花尔

① 《奏为呼伦贝尔局势烦忧请加添兵队乘时布置期弭后日隐患事》,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汉文录副03-6033-08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清)程德全撰:《赐福楼笔记》,转引自李兴盛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6页。

③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9页。

④ (清)程德全撰:《赐福楼笔记》,转引自李兴盛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759页。

基等处大量的林木资源遭到攫取。^① 就连呼伦贝尔南部的渔业资源,此时也被俄国人借机强行侵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天,沙俄外交官员迫使黑龙江将军达桂下令,向俄国哥萨克开放圣地呼伦湖以外水域的捕鱼权利,^②将此此前哥萨克的非法行为合法化。中东铁路帮助沙俄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呼伦贝尔形成全方位控制,成为侵略者插入中国东北腹地和内蒙古地区的楔子。

从中东铁路修建到日俄战争期间,沙俄除加深对呼伦贝尔的侵略外,还向索岳尔济山以南各蒙旗渗透势力。呼伦贝尔连同中东铁路西线,就此成为沙俄向东蒙古进一步扩张的跳板。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沙俄方面极力拉拢东蒙古王公,大规模购买和掠取资源,利用“交战区”以外的东蒙草原肆意运送士兵和物资,呼伦贝尔和哲里木盟北部等地已然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年里,在东蒙草原先后出现了札萨克图郡王乌泰接收俄军驻扎、收取俄国军火,郭尔罗斯后旗贵族三喇嘛向中东铁路公司出卖旗地的事件。程德全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指明:“查黑龙江僻在东北,处各蒙尾间。西南两面,皆为蒙古所包。江省安设驻防之意,明为保障边疆,亦隐以制驭各蒙……若再因循废置,不急设法精英,恐俄人诱胁多端,各蒙一为所动,蒙古即非我有。如此则江省声息顿隔,吉林亦孤立东隅,不啻在人掌中。”^③这一年八月,即将在呼伦贝尔推行新政的程德全奏请苏那穆策麟接任副都统。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刻,程德全对呼伦贝尔的地缘政治重要意义做出了空前的评价:“查呼伦贝尔地方逼近俄疆,铁路经行,所有内政外交在在均关紧要。”^④

这一历史过程不仅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也是欧亚大陆近代史上的大变局。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做出了整体的评价:“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在古代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⑤程德全的感慨,正好和麦金德的“枢纽观”不谋而合。

① 相关资料参见:署理呼伦贝尔副都统苏那穆策麟为呈报五翼旗乱后损失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日,内蒙古档案馆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案,档案号(501-1-7),000074-000077;署理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为俄人招收华工越境伐木交涉事咨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文,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内蒙古档案馆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案,档案号(501-1-7),000145-000148。

② [俄]巴兰诺夫:《巴尔虎(呼伦贝尔)》,哈尔滨:1916年版,第10—11页(A. M. Баранов. Барга. Харбин, 1916. С. 10-11)。

③ 密陈开通各蒙折,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具奏,转引自李兴盛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252页。

④ 苏那穆策麟署呼伦贝尔副都统片,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具奏,转引自李兴盛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192页。

⑤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0页。

四、针对沙俄扩张的呼伦贝尔新政

晚清以来,俄国人渗透的加强,也使得清朝人越发注意到呼伦贝尔的军事与经济意义。在“庚子之变”和日俄战争的惨痛教训之下,清政府和黑龙江地方官员不得不做出应对,加强呼伦贝尔边疆建设的要求也迫在眉睫。当1905年清朝实施新政时,位于边防重地的呼伦贝尔自然也被纳入新政设想中。在认识到地缘政治意义后,清朝官员推行呼伦贝尔新政不仅是保证一地安全,更是对沙俄东侵的全面整体防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末,署理黑龙江将军程德全首先针对呼伦贝尔未来的全面经济开发给出了初步方案,这种方案针对的是沙俄以呼伦贝尔为跳板渗入东北和蒙古高原的野心。方案开明宗义,点出中东铁路建立后“该处为铁路入满洲首境”,“近以铁路畅行,外人欲据为己有,自应及时经营,俾免利权外溢”。^①在具体开发方略的问题上,程德全方案给出了几项经济开发的着眼点,在“呼伦贝尔城所属河泡产鱼”,“珠尔毕特暨巴彦察罕等泡出盐”及“鱼盐而外尚有木植一宗”。^②这几个着眼点带有明显同沙俄针锋相对的特征,目的就在于在前哨阵地呼伦贝尔制止沙俄的掠夺,防范沙俄进一步扩张。十余日后,程氏又上《统筹善后十四条折》,明确提出了对呼伦贝尔的整体战略考察。“然从前闭关自守,彼此不相问闻,尚无外人之搀越。今该城为轮车入满洲首境,中外杂居,其西北边界与俄人犬牙相错,彼则不惜重资竭力经画,颇存蚕食之心。”^③新政时期黑龙江与呼伦贝尔地方官员形成的防俄思想,成为呼伦贝尔新政的基本思路。

沿着这个思路,黑龙江地方官员开始了对呼伦贝尔的资源调查。1906年,黑龙江将军苏那穆策麟详细巡阅了呼伦贝尔南部的草原地区。1907年和1908年,黑龙江和呼伦贝尔的地方官吏对呼伦贝尔的不同地区分别进行了调查与巡视。赵春芳深入奇乾河与乌鲁及其河一带调查驯鹿鄂温克人,^④都统宋小濂率赵春芳等视察了额尔古纳河沿边一线,而毕调元则对拟开发的吉拉林金矿

① 署理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开设总分各局试办呼伦贝尔所属地方捕鱼采盐伐木事,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01-1074-071。

② 同上。

③ 统筹善后十四条折,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具奏,转引自李兴盛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259页。

④ 奇乾河和乌鲁及其河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两条支流的名称。

进行了考察。通过几路调查,清政府对呼伦贝尔地理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了解。到1908年前后,地方官员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呼伦贝尔边境在防御沙俄问题上的意义,随之而来的是对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地区的全面开发。呼伦贝尔最终形成了兼有经济开发、政治控制和军事强化功能,顾及辖境全局的新政方案。

实际开发计划首先从额尔古纳河沿岸开始。在《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签订后,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等界河成为东北中俄边界唯一的屏障,江防也成了黑龙江边疆管理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呼伦贝尔新政中对额尔古纳河沿岸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就是江防设想的重要部分。在军事力量不足且额尔古纳河右岸没有纵深的情况下,如何在沿江地区尽快聚集民众、积累军需和矿业资源,就成为重中之重。对额尔古纳河沿岸的开发,存在“矿屯”与“屯垦”两种思路。“矿屯”思想始于洋务运动后期的知识分子。薛福成在光绪五年所上《筹洋刍议》中,提出了在官办矿务和商办矿务之外,建立由边疆地区防营组织的采矿机制,谓之“矿屯一法”。^① 光绪十二年李金镛赴漠河办理金矿事务之时,马建忠又作《上李伯相论漠河开矿事宜禀》,进一步详细提出了以官兵开矿、以矿丁充营的矿屯之法。马建忠将薛福成在西南滇黔组织矿屯的设想移植到了黑龙江流域开发提案中。在马氏眼中,矿屯式方案主要针对的正是黑龙江与大兴安岭地区的特殊状况。一方面,这一带在19世纪后期边患骤紧,黑龙江中上游的漠河各处金厂安全形势极为不乐观;另一方面,这里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生活物资转运不易,近代大型机器更难以使用,官办和商办实施起来都有困难。马氏将这种不易处境总结为:“由官办则筹备巨款,度支维艰……由商办则募股远来,商情携贰,糜费甚大……由官督民采,则贫民瘠户,工本不敷……”^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提议在吉拉林设置时即称“吉拉林一带地处边远,逼近强邻,一切垦务矿务等事亟宜派员设治”。^③ 吉拉林等矿厂的资源其实并非极其丰富,俄国人越境开挖收效也不大,这里的金矿难以同建立过“热尔图加共和国”的漠河相提并论。苏那穆策麟就坦承“去年

① 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② 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③ 程德全等为吉拉林一带垦务派员设治并刊发光防事给署黑龙江副都统姚福升照会,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东北边疆档案·第13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1906年)由省派员带领矿丁前往试办,有无成效尚不知”。^① 毕调元同年所见吉拉林前景也不甚明朗,其时吉拉林西小沟一带“有金夫二十余名在彼作工……金夫三人一班或二人一班,每日约获金五六分或一二钱”,“与金厂提调委员研究未见成效原因,该提调等均谓实因资本不足无力采苗故也”。^② 在交通最不便的额尔古纳河中办理矿屯,其政治意义要大于经济收益。对于试办吉拉林金厂及其后困难,程德全也坦言:“全于收复都鲁河金厂后,即注意于吉拉林,以为欲去该处俄人,非抵制以多数华人不可,欲养多数华人,非从开矿入手不可……宗旨在于驱遣异族,保守主权,其他固不计也。”^③

和“矿屯”相比,传统屯垦方式也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将移民重点置于额尔古纳,正是因为中俄边境为边防要地,沿边若单靠来自根河以南地区的八旗官兵轮值,很难起到作用。从移民实边的思路出发,这一地区也自然是重中之重。在雍正后期和乾隆朝,呼伦贝尔八旗曾经试行过几次屯垦计划,最终均行废止。到了清末,苏那穆策麟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④再次提出了在呼伦贝尔进行农业开垦的设想,谓之“至边荒场如铁路以北之札敦河口,乌纳尔河源并库勒得尔河口及根河北岸等处……定章咨请徐徐招民开垦”。^⑤ 屯垦思想的重点在于以屯垦聚人口,达到实边目的。对于这点,程德全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更明确地吐露了他对屯垦的实际期望:“窃冀耕凿日久,生聚日繁,于辟荒中寓实变之意,立御外之规,并非为国家益赋起见也。”^⑥ 程氏总结屯田意义有四个方面:“该处已有俄人垦成熟地二十万亩,当年即可收获,其利一;屯田一兴,则俄民自然不能越垦,边患可弭,其利二;罪犯流民咸有恒产,田间多一农夫,则地方少一土匪,其利三;既有屯丁,则卡伦可裁,岁省虚耗,其利四。”^⑦ 正如程氏所言,屯垦的着眼点在于边防安全,相比之下经济收益的考量还要退而求其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俄方一度向黑龙江当局提出过仿效珲春韩民交租承种之例,换取在呼伦贝尔越境垦种合法权利的办法,中方一度也有赞同此法的官员。但是,额尔古纳沿岸的边境长度与交通重要性,令中

① 《苏都护呼伦贝尔调查八旗风俗各事务咨部报告书》,呼伦贝尔历史研究会1986年铅印版,第9页。

② 毕调元赴吉拉林调查边务日记,《近代史资料》第83期,第86页。

③ (清)程德全撰:《赐福楼启事》,转引自李兴盛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933页。

④ 苏那穆策麟:《调查八旗风俗各事务咨部报告书》呈奉日期写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而其称“曾于去年三月十九日定章咨请”,则报告应作于1905年。

⑤ 《苏都护呼伦贝尔调查八旗风俗各事务咨部报告书》,呼伦贝尔历史研究会1986年铅印版,第2页。

⑥ 复陈筹办江省善后情形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具奏,转引自李兴盛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339页。

⑦ (清)程德全撰:《赐福楼启事》,转引自李兴盛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914页。

方官员不得不防范俄罗斯人的全面渗入。程德全拒绝了这一提议,谓之“江省东北处处与俄接壤,藩篱一决,流弊无穷”。^①

新政移民招垦引起了呼伦贝尔设治后的第二次“内地移民浪潮”。^②对于周边缺少产粮区的呼伦贝尔,军粮仓储一直是个大问题。周边的外蒙古车臣汗部和内蒙古哲里木盟北部区域自然难以向呼伦贝尔供应粮食,即使在清代屯垦较早的齐齐哈尔一带,至光绪朝末期,可资外运的粮食仍然有限,能够用以输送呼伦贝尔的更是少之有少。据俄国人博罗班所调查,清末时,齐齐哈尔“当地面粉外运的总量很不显眼。1907年,通过铁路的外运量约为两万普特。据称尚有自齐齐哈尔向海拉尔的大车运输,但其总量微不足道,因为它们主要运自周边小村”。^③新政中呼伦贝尔的招垦并不顺利,偏远的地理位置与不适宜农业的环境,在招垦初期令“富民观望不前,穷寒乏前”。^④由于地理不便,移民总量并不算大,这次移民对呼伦贝尔的整体影响是有限的。不过移民中也出现了某些成功者,在额尔古纳沿岸,“直隶农人王鸿滨者,二三年竟获利五六千卢布”。^⑤

对于新政时期呼伦贝尔的屯垦开发同之前经济形态的区别,20世纪20年代所编纂的《呼伦贝尔志略》将其概括为“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纯取游牧备兵主义;光绪三十三年以后,改用屯田实边主义”。^⑥此种论断有失偏颇。最早做出呼伦贝尔开发完整方案的末任副都统宋小濂,在开发方式上兼顾到呼伦贝尔的特殊性。他提出的全盘计划不是纯粹的农垦,而是耕牧结合。“沿边既设卡伦,略仿屯垦之法,逐渐开辟,腹地亦应招垦,以尽地力。为蒙旗素以牧畜为业,其素所游牧之地,未便即行开放,致有侵扰。应用耕牧并兴之法,将沿铁路两旁各三四十里择腴招放,既于牧场无碍,而往来捷便,令户亦易招徕。”^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呼伦贝尔新政已然超越了单纯的徙民实边路线,而具有多元化的策略。

新政时期的中方官员除了关注边境防务外,也重视呼伦贝尔南部地区在

① (清)程德全撰:《赐福楼启事》,转引自李兴盛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第913页。

② 第二次移民浪潮的提法,参见奇文瑛:《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两次移民与得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俄]博洛班:《齐齐哈尔经济概况》,《亚洲通报》1909年第1期,第74—121页(A. Болобань. Цицихар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Вестник Азии, Харбин, 1909. №. 1, С. 74-121)。

④ 《苏都护呼伦贝尔调查八旗风俗各事务咨部报告书》,呼伦贝尔历史研究会1986年铅印版,第2页。

⑤ 赵春芳撰:《边务采辑报告》第二册,《呼伦贝尔纪略·土质纪略》。

⑥ 程廷桓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第71页。

⑦ 同上,第74页。

新的时代中地缘政治意义的凸显。正如麦金德所言,在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修建后,呼伦贝尔已经成为欧亚大陆枢纽的一部分,其意义远非前代可比。中东铁路的修建,使得俄国势力渗入原本封闭的巴尔虎草原,而设于满洲里车站的中方铁路交涉分局,却没有处理路外交涉适宜的权限,这对清朝方面极其不利。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程德全呈札文给度支局,建议在呼伦贝尔设立边垦局,所陈原因除了沿江防御之外,还特别强调了对中东铁路周边加强控制的重要性。宋氏言道:“向有铁路交涉分局设立该地,然只能于铁路界内管理,所有界外一切事宜均非该局权力所及……凡沿边物产,暨呼伦湖一带刈草捕鱼、砍伐柳条诸事皆听其窃取。”^①同一年的农历秋八月,准备改任道台的护理副都统宋小濂赶赴呼伦贝尔最大的藏传佛教寿宁寺,主持庙市的开市仪式。作为新政下的末任副都统,宋小濂的心态与前任者已有很大不同。虽然仍是以副都统身份视察寿宁寺,宋氏此时已然预先以道台自居。^②不过,此时他已经注意到一点,呼伦贝尔同蒙旗之间的经济交往中心和呼伦贝尔八旗民众最重要的城市,不是海拉尔,也不是新近崛起的满洲里车站,而是寿宁寺。这种传统的地区市场,原本不在清末调查大纲的框架内,宋小濂对其关注实出于政治家的敏锐。庙市之后,宋氏撰写了《寿宁寺市场记》一文,这篇文章反映出生长于汉族文化环境中的官员对呼伦贝尔八旗各族经济文化少有的重视。随着沙俄向东部蒙古渗透能力的进一步加强,也随着中方新政的开展,黑龙江官员与呼伦贝尔地方官员着眼之处由沿边地带转向中东铁路沿线,由中东铁路转向处于腹地的草原地区,其视野日趋整体性。呼伦贝尔新政中的宏大构想与整体方案,不仅是出于对额尔古纳河江防形势与中东铁路沿线安全的重视,也体现了从朝廷到地方对呼伦贝尔沟通蒙古和东北的“枢纽”意义的进一步认识。

① 程德全等为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咨请添设边垦局并拟开支章程应准招办事给度支司札文,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四,《东北边疆档案·第134册》,第297—298页。

② 1908—1909年游历大兴安岭地区的俄人特列季亚克,全程参与了1908年的甘珠尔庙市,他称宋小濂为“海拉尔道台,宋副都统”(хайларский даотай, флигел-адъютант сун)。那时呼伦贝尔尚未改道,道台也未开缺,宋小濂此时的身份依然是副都统,军机处记名道,“海拉尔道台”更非正确官职。这个奇怪的称号之所以出现,大概是宋氏在内外交涉中已经全面预以道台自居了。参见〔俄〕特列季亚克:《兴安周边考察日记》,《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记事》,1912年第1期(Третьяк. Дневни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округ Хингана//Записк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 Р. Г. О., Хабаровск, 1912, Т. 8. Вып. 1)。

结 语

在地缘政治的视角下,中俄两国在呼伦贝尔两侧的政治地理学进程既是相互独立,也相互影响的。俄国方面,沙俄在线性边界稳定的情况下向南不断进行有效领土扩展,其边疆地带随着哥萨克的铁蹄不断向前扩张,不断加剧着对中国的威胁。尤其在19世纪末,铁路将俄罗斯的心脏地带和有效控制的西伯利亚同远东直接连通,俄国一跃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体。对清朝来说,在19世纪中叶之前,额尔古纳边境区是一个地理隔绝的狭小边境带,周边是广大的空旷区。18世纪清朝曾经试图将这个小区域建设成齐齐哈尔一样的有效控制区,却由于内部和经济与交通不利条件,而一直没有更大发展。从19世纪中叶到日俄战争之后,额尔古纳河至大兴安岭一线才渐渐转变为对俄边防重地。

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人对中俄东段边界地缘政治意义重新认识。17世纪末的雅克萨之战和噶尔丹第一次东征,呼伦贝尔对于整个清政权曾有着防御卫拉特贵族和沙俄哥萨克的前哨重地意义。在200多年后,呼伦贝尔的重要地理意义被中国人重新认识。虽然麦金德的理论此时还并不被人熟知,麦氏看到的全局危险已然被有识之士所重视。1907年,考察额尔古纳河沿岸地区的宋小濂明言:“呼伦贝尔为黑龙江西边门户,外蒙古尾闾,有屏蔽省城,控制喀尔喀之势。”^①1905年和1906年两次随肃亲王善耆调查蒙古盟旗的姚锡光虽未涉足呼伦贝尔,但凭其在东蒙所闻所感,也看到沙俄通过呼伦贝尔渗透入东蒙的危险性。姚氏疾呼“俄人见拟从满洲里车站(中俄交界第一车站)接造西伯利亚支路,即循此东大道经车臣汗部西南行,入乌珠穆沁、浩齐特之交,穿克什克腾达喇嘛庙,以趋张家口……此项支路若果敷设,则横截我东部内蒙古之腰,而近畿、长城以北无安枕之日矣。”^②沙俄的东侵不仅刺激了呼伦贝尔的开发,也唤醒了更多的官员与士人对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安全局势的重新重视。宣统年间,上海名士姚文栋在所撰《东北筹边论》中大声疾呼:“所谓沿江上下所在皆限,而尤以额尔古纳河道入黑龙江口一处为最要。俄若阑入额尔古纳河,进踞呼伦贝尔。则江省与蒙古声息中断,俄得以纵横自如。江省既无自全

① (清)宋小濂:《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载李澍田主编《宋小濂集》,第99页。

② 姚锡光撰:《筹蒙刍议》,载《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之策,蒙古亦大有危机矣!”^①军事上长期被忽略的呼伦贝尔,随政治形势变化重新成为中俄交锋的关键地带,继而内蒙古东四盟和呼伦贝尔也被纳入同一个安全视域上。从康熙时期到清末,在官方视角下,这个区域从边防要地转为宁静之地,最终又转为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冲要之地,通过观念的转变,体现的则是地缘政治的动态变化。

近代中国的边患原因常常被简单地归结为“积弊”二字,近人观之常为此深憾不已。陈复光总结1840年以后中俄关系,叹曰:“清朝不痛定思痛,力图自强,形成远东之安定力量,乃苟且偷安,昏庸腐朽,沦国家为次殖民地,成为列强斗争之对象。”^②其实,后人观察前代历史总是从结果出发,而历史中的情势变化却是复杂的。地缘政治的变动并非一朝一夕之势,也非一刀一枪之功,新政时期清朝应对呼伦贝尔局势变化的过程,又何尝不是在变化中尝试应对挑战。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只是徒然惋惜的对象,它所展示的政治、军事与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历史进程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令人深思。

① (清)陈龙昌辑:《中西兵略指掌·卷二十三》,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96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版,第447页。

②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清俄关系》,上海书店1947年版,“弁言”,第3页。